

第一章 既威胁又拉拢 窃贼当总统

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
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

——孙中山

袁世凯这个人，只要提到中国近代史就不能不言及他，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黑暗的记载。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民主共和国的种子播进许多中国人的心田并开始发芽生根之后，如果中国还有一个人想役天下于一姓的话，那么这个人肯定是袁世凯。

虽然时至今日，在许多人心目中袁世凯的印象仅止于咣啷咣啷作响的袁大头而已，

袁世凯，字愚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有袁项城之称。

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位称孤道寡却“淹死”于国人唾沫之中的传奇人物的人生履历！

袁世凯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抑郁不得志，四处漂泊，浪迹天涯。为出人头地而萌生参军之意，投靠于淮军头领吴长庆麾下，充庆军营务处帮办之职。

1882 年，朝鲜汉城发生“兵变”，袁世凯以前敌营务处统兵随吴长庆进驻朝鲜，协助朝鲜国王镇压兵变。吴长庆班师回国，袁世凯接任淮军庆字营头目之职。

1885 年，因“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之故而留驻朝鲜。

1894 年，风雨如晦，鸦片战争前夕。袁世凯请调回国，蒙“隆恩”授浙江温处道，派充督办军务处差委。“撰译兵书，以博时舆。”

1894 年，甲午中日战争，比进关之前八旗兵尚不如的满清旧式军队一败而肝脑涂地，这是他们面对日本精锐兵力、优良武备的必然结果，因为在战场上真正能拿得出来一较高低的只有实力！

这种令人捶胸顿足的结局使满清王朝的肉食者们“恫丧师，知募兵不足恃”于切肤之痛中感到“筹饷练兵为急务”。于是统治者中头脑稍为清醒的大臣甚或于那些在战场懦弱无能惟知逃命的人都纷纷进言献策，指陈弊端，真可谓一时中外之臣，交章纷奏。

在这些纷至沓来的由漆雕盘子落到清朝皇帝案头的奏章中，有一个十分明显而几乎人人提及的要求：

“维今日事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第一要著。”

时至于此，讲惯了王者之师、王师之仪，讲惯了三纲五常、四维八张的中国旧式统治者再也顾不得些许斯文了，也许他们自己也厌烦了搞什么“华夷之辩”，也许他们自己不屑于坚持什么“体用之争”，沉重的事实使得他们不得不由“务虚”而“务实”了。

于是在 1894 年，在那个经历了惨败的肃杀萧条的冬天，一道圣旨传出了紫禁城，清朝的顶戴花翎中又多了一个新的职位。

清政府命令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招募丁壮，训练新军，名为“定武军”。

到了 1895 年，清廷又一纸调令胡燏棻督办津卢铁路，小站练兵一事便由袁世凯而继之。

这个机遇对于袁世凯来说，真可谓是天假以时，天假以位。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前任给袁世凯留下的“基业”吧！

小站练兵期间，胡燏棻一共招募了十营兵士，其中步兵三个，炮兵 1000 人，马队有 250 人，工程队有 500 人，加在一起总共是 4750 人。

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的职位后，觉得胡燏棻的模式与规格十分不合自己的口味。于是开始移花接木，抽梁换柱。搞了一次次不小的整顿，整顿后不久就扩充了 2000 名步兵，250 名马队，这样总数就变成了 7000 人，并且名字也给改成了“新建陆军”，这比“定武军”就多了一些务实和新生的味道。

此后，袁世凯又按照自己的意图在“新建陆军”中建立了一整套的领导体制：

总部设有督练处，这是全军的最高领导机构，那么督练一职自然非袁世凯本人莫属了。在督练处以下又设有参课、执法、督操等营务处，徐世昌、王英楷、梁华殿分别是三个职能部门的长官——总办。

除此之外，还设有中军文案、粮饷、军械、转运、军医各局和教习处。军士一分为二——左翼和右翼，其中左翼辖步兵两营，右翼辖步兵三营，总部则有直辖炮兵、骑兵、工程各营。

“新建陆军”是一支不同于湘淮军和绿营等旧军的新式军队。它不仅全用西方新式军械装备，仿照西方洋操，甚至连征兵制度也是仿效西方建立的。把年青强壮的人招募来当兵，凡

是吸食鸦片的，一律不接受，还以近代军事学知识武装军队，创办了随营学堂，对士兵进行了军事技术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教育。从北洋武备学堂中吸收了一些具有近代军事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当各级军佐之职，从而令这支军队与清末的其他军队相比不可不说是面貌焕然一新，军队素质因而也大为改观。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但他的这种头脑是以损害人民的利益和阻拦历史的脚步为前提的。

袁世凯为了能够增强他的“新建陆军”的战斗力，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营规和军纪，其中有这样的规定：

士兵每年给假 3 个月，如果遇到征调，必须在征调守毕后予以补假。平常之时必须“谨守法律”凡临阵退缩、交头接耳、诈病不前，遇差逃之，或者结盟立会，造谣惑众，持械斗殴、聚众哄闹、惊叫乱伍的，一律都处以斩首之刑，严惩不怠。

为了安定军心，袁世凯全力废除旧式军队中司空见惯的“饷薄”的克扣军饷的陈规恶习，而是实行厚饷制度。规定在营士兵每日的薪水是四两五钱，头目则在五两以上，军队每逢发军饷的日子，都由饷局按名册事先包好，直接发给士兵，在这个过程中任何营员都不得插手或干预，否则将处以军法，并且还要派专门的人进行监督。

虽然袁世凯的军队运行方式看起来焕然一新，属前所少有的，但是袁世凯却继承了湘淮军的衣钵，在想把“新建陆军”极力培养成忠于自己的封建军事力量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与曾国藩、左宗棠如出一门，一脉相承。

为了达到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满足他的狼子野心，他招徕了大批封建文人，给兵丁们讲解所谓的“经史大义”，加强了对兵丁的思想灌输与禁锢，向兵丁们灌输了伦理纲常。

他甚至让人把那些“经史文章”编成歌诀，让兵士们每日

背诵。这样年复一年，日经一日，把士兵们一个个都变成了维护封建地主统治的卫士。

其中，袁世凯向士兵灌输得最多的就是“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思想，以使兵丁们效忠于自己。那个时候各个营房里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让士兵们定期叩头，使兵士们心中只有袁世凯，不知有清朝。

为了培植自己的军阀势力，袁世凯从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加紧了对“新建陆军”的控制。袁世凯在这一方面可谓是天造之才，恐怕鲜有出其右者。亲情、乡情、友情、权力、金钱等等几乎都成为他的工具和诱饵。

他通过吸收义子门生、结拜兄弟、结亲翁等封建习俗，以及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手段，网罗并培植党羽，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人都先后被袁世凯挖入“新建陆军”，分别从袁世凯那里谋取了参谋营各处总办、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步兵学堂和督练营务处总办、工程学堂总办兼工程兵统带。

袁世凯又把原来“定武军”将领段芝贵、曹锟、卢永祥和湘淮军旧部张勋、姜桂题、倪嗣冲、田中玉、孟恩远等拉拢过来，分别委以重任，成为袁的骨干力量，为袁世凯牢牢地控制这支新建陆军，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奠定了基础。

就这样地苦心经营，再三筛选，袁世凯训练了一支拥有7000人的“新建陆军”这样一支崭新军队在当时无疑是一笔雄厚的有绝对分量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些，他就开始涉及政界，进行形形色色的政治投机。

在历史上著名的1895年至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就开始了他在政治上投机的游戏。他一方面捐出重金加入了北

京的维新派团体强学会，另一方面又遍访顽固派头目，为之通风报信，袁世凯就这样脚踏两只船，坐而观望，见风使舵，最终还是出卖了维新派。

通过这种巧妙的两面手法，袁世凯博得了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一致认可与赞赏。慈禧太后称袁世凯是“才堪大用”，帝国主义也美誉其“乃一有魄力”；“稍知兵学”的“一位能干勇敢的人”。

在此期间，袁世凯虽然广泛加强对各政治力量的联系，不过，他还是把他的军事组织放在首位。到 1896 年 10 月，他的军队就达到了 7400 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山东。这支军队的招兵标准是高于一般的军队的，这表明袁世凯希望获得比一般中国兵士素质更高的兵员。

袁世凯的这一措施是有明显好处的。他的士兵堪称中国军队体格强健的范例。他们的制服和大部分装备都是适用的，并且保管的很好，整队操练和军队风气都良好。

在野外学习中，官兵都表现出能够了解自己的职责。发给士兵的德制毛瑟枪，骑兵持有毛瑟枪和长矛，炮兵共有十队，每队发配一至六磅大小不等的炮六门。与大多数中国军队不同的是，这个军队有速射机关枪！不难看出袁世凯在治军方面是有一定能力的。

1899 年，山东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团民们高举着“扶清灭洋”的大旗，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中外反动统治者胆战心惊，魂丧魄失。在这时，中外反动派都需要一个镇压义和团的刽子手。他们居然不约而同地选中了袁世凯。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一跃而为山东巡抚，开始了对山东义和团惨无人道的屠杀。

1899年12月底袁世凯率领由‘新建陆军’改编而成的武卫右军，一路杀气冲天地来到了山东。袁世凯一到山东，马上就颁发了《禁止山东义和拳匪告示》和《严禁拳匪暂行章程》，把义和团爱国群众诬称为匪，命令部众会同各县、州、府“认真查办，分拨查缉，务将各个州县附近各散厂一律查禁标封”，对于“既泛讯系拳匪”，自应“一并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以昭炯戒”，“如有逃逸，必须悬赏购线，务获查办，毋任漏网”。“如敢拒捕格杀勿论不得稍涉宽纵至酿巨患。”所设坛厂，一律毁平。窝匪之家及知情不报之庄长地方，挨次查明，分别惩办。”其有纵令幼童、幼女私习邪行者查明罪坐家长。”对义和团农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慈禧太后为了应一时之需，以发泄对帝国主义袒护光绪皇帝的不满，便对义和团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段假惺惺地称义和团是“义民”、“义兵”把“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驱驰前线，抵抗八国联军，并命令各省督抚继续将“此等义民”招抚成团，抵抗外侮。借帝国主义屠刀，残杀义和团的怀抱满腔爱国热情、不识官场险恶的农民。

而袁世凯做得更为露骨，连这点假面具都不带，他以“山东省拳民均已赴直境助战”为借口，把留在山东继续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开赴津沽、途经山东省的义和团诬蔑为“黑匪”、“土匪”进行疯狂的屠杀。

他指示各州县令及其反动军队：“凡窜扰本省各州、县假托义民寻仇劫杀者即是土匪乱民”必须“严行查办相机剿办，不得稍存姑息致酿衅端”。

袁世凯虽然对于义和团的爱国民众是如此心狠手毒，但是在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却表现得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一副十

足的奴才相。在镇压山东义和团的时候，对于义和团民众恨得是咬牙切齿，严密防范弹压。而对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扮演侵略中国急先锋的角色的外国传教士，“着按照条约认真保护教士教堂”。

当陵县刘家寨教民“招聚邻境及直隶教民坚筑重围，悬挂枪炮”，仗势欺压民众，驱逐同居民人出寨时，袁世凯听说后非但不加以制止，责令刘家寨教民撤围解散，反而庇护教民，胡说什么刘家寨教民是为了“自固，不过藉以自卫身家”，并且故意指鹿为马，颠倒是非，把被教民驱逐的居民出于愤怒而围寨反击诬蔑为匪，恐吓道：“该匪徒托名仇教，聚众围寨，迭次故意寻衅，实系纠伙抢劫得财，自与土匪乱民无异”，下令给以严厉镇压，并且把由于同情受欺侮的居民而镇压不力的陵县县令革职查办。

袁世凯不但处处庇护教士、教民，还千方百计地讨好帝国主义分子。他出钱出力把那些被义和团民众焚烧的教堂、教所一个个地修葺、整饬一新，对于受到义和团严厉惩罚而罪有应得的教士、教民，一个个地进行抚恤，甚至到了给他们树碑立传的无耻地步。

为了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袁世凯甚至不惜将各坛、厂夷为平地，查抄了义和团民众的财产，而把这些财产用于抚恤教士、教民和重建教堂的资金，规定了“查封拳厂房地及查抄拳匪财产等项，变价充公，即以此款作为抚恤之用”。

对于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袁世凯更是奴颜屈膝，他曾多次告诫他的部下，“如果洋兵来境，务必优礼相待，并先将队伍安置在距边界较远的地方……凡事皆先其用，俾与和局无碍，切不可轻启衅端”。要求各州县“严厉约束勇丁，认真弹压地方，勿使生事”以“奠安边境为第一要义”。他深恐开罪帝国主义，

并因为得不到他们的谅解而有碍“和局”，成了一个彻头彻尾“老实忠厚”的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

在我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一个人能否拉帮结派、结党私营，往往能够决定他在官场的前程，袁世凯深谙此道可谓行家里手。

袁世凯在以其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山东义和团之后，博得了中外主子的欢声喝彩，自此而青云直上，官运亨通。在1901年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于是袁世凯带领他藉以发迹的武卫右军，威风凛凛地一路回到直隶，真可谓是用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戴花翎。

也许是袁世凯尝到了这支军队给他带来的好处，到了直隶之后就大力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扩充其反动武装，进一步扩张了他的个人军阀势力。

1902年，他先后从正定、大名、冀州等地招募了6000名“新练军”，命名为“北洋常备军”。

同时，袁世凯还在督署创设了军政司，以此为其治军的负责机关，督办一职由袁世凯自任。下辖参谋、教练、兵备之处，以段祺瑞、冯国璋、刘永庆分任三处总办，来综合管理全省的军队事务，在中国历史上名噪一时的“北洋军”的名目也就从此开始了。

北洋常备军在建立之初的编制是一个军，这个军又被分为左右两镇，其中每镇大约有士兵1.25万人，共计是2.5万余人，在这以后，每年都有增添，逐年扩充。

在1903年到1904年间，左右两镇先后建成，于是就改称为“北洋常备军第一、二镇”。

1904年初，日俄战争战火燃起，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在我国东北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这时

身为清廷近畿封疆大吏的袁世凯，不但不提出抗议，进行抵御，反而混水摸鱼，趁机扩张其个人军阀势力，借口防务之急，一而再地扩充北洋常备军。

1904 年，他以早先由武右军改编成的巡警营北段 1500 人为骨干，添募新兵，扩编为北洋第三镇，接着，又将武卫右军的一部，与从江南调过来的由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合并，加以扩充，编成了北洋第五镇。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在 1903 年左右，选拔了北京八旗兵丁三千余名，称为“京旗常备军”，号称“京旗禁旅”。这就逐渐形成了人们所熟悉的北洋六镇。

袁世凯为了加强对北洋六镇的控制和渗透，把他在天津小站练兵时的死党王英楷、段祺瑞、吴凤岭、吴长纯、王士珍等，分别任命为各镇的统制。

这样，北洋六镇除了第一镇因为是“京旗常备军”而不能完全由袁世凯控制外，其余的都全部牢牢地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在组织北洋六镇、网罗人马的同时，为了让自己的羽翼更加丰满，让自己的势力更为庞大，袁世凯不断地向政界、财界甚至是巡警部门扩张势力，逐渐地形成了他的军阀集团。

1901 年初，在经受义和团革命暴风雨冲击后的清王朝，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欺骗迷惑人民群众，消弭革命，抑制进步势力，开始实现以编练常备军、创立巡警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政”。于 1903 年设立了练兵处，作为督练全国新军的总机关，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帮办大臣，随时去“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成效”，袁世凯把这认为是扩充他个人势力的绝好机会，就把他在北洋系统的死党纷纷地安插在练兵处，以徐世昌为总提调，刘永庆、段祺瑞、王士珍等分别任军政、军令、军学司正使，冯国璋、陆

建章等为副使，练兵处的要职悉入袁世凯手下人之囊中，他们假公济私，营私舞弊，把每年以练兵处名义筹得的数百万练兵费，集中使用在北洋军方面。

袁世凯一面创练北洋新军，同时还创办巡警。

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创办了警务局，从武卫右军抽调了3000人，由赵秉钧负责编成巡警营，紧接着又在天津设立巡警局。

到1905年的时候，清朝正式成立了巡警部，袁世凯就推荐他的私党徐世昌、赵秉钧分别担任了巡警部尚书和侍郎，从而清朝的巡警大权也成为袁世凯的掌中之物。

这些大权在握还不算，袁世凯本人还兼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等要职。他利用职权之便，先后从买办官僚盛宣怀手中夺取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以及一部分铁路大权。他任用其私党幕僚梁士诒为铁路公司的总文案，以及后来的京汉、沪宁、正太等五条铁路提调，把铁路借款转化为收入，并把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收入全都藏进了他个人的腰包。

另外，袁世凯还先后开办了滦州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代办户部银行和德国、比利时等合伙创办井陉、临城煤矿，并且利用他手中所窃取的权力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加紧搜刮、发行公债，设立销盐局、铜元局、银元局，创办印花局，增加了许多名目的捐税，疯狂地盘剥人民，奠定了他的军阀集团势力的经济基础。

至此，以袁世凯为总首领的北洋军阀集团就最终形成了。袁世凯的爪牙遍布了各要职，甚至于连朝廷内都有他的心腹，他一个人就独揽了吏、户、兵、工四部的大权。这就引起了清朝皇室的严重不安。

伴随着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和袁世凯个人权势的迅速膨胀，对满清王室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引起了皇亲贵族的一些少壮派的忧虑与不满，他们纷纷提出要以“新政”为名，攘夺袁世凯的权力，从而加强中央集权。

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在双方之间展开了。袁世凯由于缺乏皇权的护符，一度被驱逐出朝。

1906年冬，清廷把兵部改为陆军部，满族的亲信贵族铁良当上了陆军部尚书，全国各省的新军都由陆军部负责统辖，这样就等于一下子摘去了袁世凯北洋六镇的兵权。

对此，袁世凯虽然以直隶境内幅员广阔，须有重兵控制把守为理由，要求把和他最为亲近的第二、四镇仍旧归他统领，但得到的不过是“暂时调遣训练”的皮毛之权。

1907年，清廷采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袁世凯当上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终于夺去了袁世凯的全部兵权。

1908年11月中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撒手归西，一个3岁的孩子溥仪继承了帝位，改年号为宣统，由他的父亲也是光绪皇帝的兄弟载沣摄政，在一些王室亲贵的协助下，为报袁世凯出卖维新变法、以致光绪帝被黜之仇，清廷准备杀了袁世凯以泄私愤，受到元老重臣奕劻和张之洞的劝阻方才罢休。张之洞认为王道平平，王道坦坦，开缺回籍就够了。

终于，满清贵族们遂了心愿。1909年1月，袁世凯由于“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而被开缺下台。

下台以后，袁世凯就回到河南彰德购建了“养寿园”，他披蓑衣，戴斗笠，种花养草，完全是一副寄情于山水之间、无心过问政治的样子。而实际上袁世凯一刻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因为政治是袁世凯的生命，离开了政治，他就是无水之鱼。在袁世凯的室内设有与北京直通的电话，随时都能够和北洋将领们

互通声息。这些北洋将领都是袁世凯安插在北洋军队的心腹亲信。

由于袁世凯的去职，他们也都郁郁不得志，因而经常和袁世凯互通声息，向袁世凯报告清廷和各地的情报，铁良连调动他们的职位的权力都行使不了。

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时刻做着东山再起的梦。他曾吟诗一首：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底！

这首诗把袁世凯不甘寂寞、待时而起的野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世凯希望看到的事终于出现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楼内燃起了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并且很快使整个中国都经受了革命的暴风雨洗礼。到这一年11月底的时候，全国24个行省，已有14个省份和全国第一个大都会上海市先行宣布独立，脱离了清朝统治。没有独立的省份也都在积极地酝酿着举行起义，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全国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维持了二百多年的清朝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危在旦夕了。

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清朝廷当即命令陆军部大臣荫昌率领第四镇为主力的第一军南下对革命进行镇压，同时命令冯国璋以第五镇为主力，迅速组织了第二军。但是清廷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又是十分明显的问题，即北洋军是袁世凯的旧部，他们除了袁世凯，连皇帝的谕旨都不关心，冯国璋能买荫昌的账吗？

荫昌根本就指挥不动，行动十分缓慢。

古人说：兵贵神速。如此磨磨蹭蹭，这样的军队根本派不上用场，有不如无！

而冯国璋一接到命令，就在心里盘算了小九九，他左右权衡：这官场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不小心就是粉身碎骨。思量来思量去，他也理不出个头绪来，看来非找个明白人讨教不可，那么去找谁呢？

冯国璋前思后虑、左瞻右顾，终于想起了一个人，这人就是袁世凯。可现在袁世凯正触着霉头呢，许多人躲都来不及，怕沾上晦气，自己也不好意思就去明目张胆地造访袁世凯！

于是，冯国璋带几个贴身侍人，轻车简装，秘密造访袁世凯去了。

袁世凯被无端开缺回籍，人走茶凉，虽然当年那些死党还在，但这些人也得有一时之忍，以遮人耳目，于是袁世凯门前自然就冷清多了。

如今冯国璋不辞远道来拜访袁世凯，袁世凯自是颇感欣慰得意，这一高兴，就向冯国璋面授了妙计——慢慢走，等着瞧。这话的含义可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不是村夫野民在那里说瞎话，撒闷气，这可是旧中国几十年官场生活摸索出来的护身符，袁世凯一席话说得冯国璋茅塞顿开，两人相视而笑，心照不宣。

革命的形势可不管什么阴谋密谋、你得我失之类的烂玩意儿，它是水涨船高。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满清的政权也就一天比一天不安定。偏偏清朝的小皇帝、老大臣除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乱转之外，拿不出来什么对策。

事情发展到这个局面，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廷权贵们再贪恋权势，缅怀那种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作威作福的日子，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怎样的货色！虽然从心里觉得对

不起他们骑在马背上打天下的老祖宗，他们还是不敢拿鸡蛋碰石头！帝国主义就更无牵无挂了，天下是姓袁还是姓爱新觉罗对于我无关痛痒！你只要能够维护我的利益，充当我的代理人，就不管你是张三还是李四。不过无论如何你们满族这批老的小的，不中用的得腾个地方了，“能者任之”嘛！

于是乎，中外反动者心有灵犀，一致感到要起用袁世凯，通过这个人来挽救清廷的危机，以济缓急。

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一个叫司戴德的美国侵略分子就说道，如果清廷能有袁世凯这样强有力的人的帮助，叛乱很快就能得到平息，美国出版的《大陆报》的做法就更有意思，居然以“时代宠儿袁世凯”为题发表社论，说什么除非清廷再次召用袁世凯参与国事，再没有任何一种行动能够使清政府取得国内外的信任。

袁世凯的私党就更为高兴了，袁世凯是他们的老大，一荣俱荣，窝囊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盼来了希望。于是这些人竭力推波助澜，到处散布“非袁莫属”、“非袁不能”的言论，就连根正苗红的满洲贵族奕劻都提出了要重用袁世凯。

满族人的政权现在已经是家道中落，辉煌不再了，连袁世凯的荣辱废存都控制不了了，哪还能树敌太多，干脆顺水推舟，总得有个人支撑门面！

于是，在内外反动势力的一致呼声之下，清廷不得不把袁世凯补授为湖广总督，同时让袁世凯负责“剿抚”事宜。

袁世凯这个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寂寞忍耐之后，终于凭借他的军事力量以及他精心编织缝缀的关系网而重新进入了政坛。

不过这一次的出山在意义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如今的清政府已是不可雕之朽木、扶不起的阿斗，帝国主

义肯定会换马，寻找新的帮凶、刽子手来镇压人民的革命！

镇压起义和革命是袁世凯的老本行和看家本领，把这个任务交给袁世凯可算是找对人了。

袁世凯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他和革命者是天敌，水火不相容！他称：我不会当革命党，就是我的子孙也不会当革命党。真可以说是顽固到家了。

但袁世凯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官场上那一套花招他比谁都精通。所以他接到了谕令并没有立即披衣整冠欣然地上任，而是反守为攻，竟以“旧患足疾，今尚未大愈”为由，故意拖延时间。他这实际上是待价而沽，他哪里有什么足疾？但这足疾是清廷给“诊断”出来的，不好说话。

千说万说，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清廷所付出的价码太小了，根本吊不起袁世凯的胃口！袁世凯自己不方便明说，于是他就暗示徐世昌向清政府提出明年立即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要宽容参与这次事变的人们，解除党见，授予指挥水陆各军以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和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等六条要求。

就在袁世凯与清廷讨价还价、争吵不休的时候，武汉的革命军攻克了刘家庙。湖北省的大部分辖区都光复了。紧接着，湖南、陕西、山西等省联翩独立。

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联合了第二十镇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实行兵谏，密谋策划起义，在清朝皇帝的宝座下埋入了革命的地雷。

清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一班人马、祖宗的百年基业就要给革命的火焰焚毁了，于是不得不接受袁世凯的全部条件，任命他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让袁世凯失去了钩心斗角、玩弄权术的雅兴，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了，于是在清廷满足了他所提出

的六项条件之后，他在 11 月 16 日立即出山，对革命进行疯狂的镇压。

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集团的支持之下，袁世凯夺取了清朝的政治、军事大权。

袁世凯上任伊始，就立即奔赴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冯国璋攻下了汉口，为了发泄他对革命的愤恨，他居然纵火焚烧汉口，搞得偌大的汉口烟雾弥漫，连人都分辨不出来。作为长江经济中心的汉口，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焦土。

11 月 27 日 汉阳也被攻下 他们就在龟山上架起大炮猛烈地轰击武昌，当时是炮声如雷，昼夜响个不停。但是袁世凯只是隔江炮击，并没有渡江攻占武昌，企图以凌厉的攻势逼迫革命党人向他就范，以实现他一箭双雕的目的。

早在出兵之前，袁世凯就酝酿着以和平攻势消弭革命的阴谋。在攻陷了汉口以后，更加紧了诱降活动，多次指使他的幕僚刘承恩致书并会见黎元洪，设置了和平解决的圈套，被革命党人严辞拒绝了。

但是，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那些被革命洪流卷进来的旧官僚、立宪派却产生了动摇，主张妥协。黎元洪甚至在给袁世凯的复信中表示：只要袁世凯“能来归”，“与君徒共扶大义，……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南北议和是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代理人袁世凯扑灭革命后的一个重大阴谋。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多数人都没认识到这一点，不能识破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狡诈用心。甚至还把议和当作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捷径，致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南